



第一卷
文学创作

小说

报告文学

游记

散文

电影剧本

诗歌

回忆录

张炯文存



湖南大学出版社

小说

报告文学

游记

散文

电影剧本

诗歌

回忆录



张炯文存

ZHANGJIONG
WENCUN DIYIJUAN

第一卷

文学创作

湖南大学出版社

张炯学术档案

张炯，汉族，福建福安人，1933年11月3日生于上海，在家乡上小学、初中，在福州三一中学读高中，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并编辑地下革命刊物《骆驼》月刊。1949年4月初到闽东北白云山区开展人民武装斗争，曾任闽浙赣人民游击队支队政委，与南下部队会师后，在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机关和部队工作。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60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派到《红旗》杂志任编辑、文化组负责人。1979年1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当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90年4月兼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1991年后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99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兼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1979年起，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并先后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和《诗探索》编委，中国文学函授大学校长、《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社社长。还被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南社暨柳亚子学会会长，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顾问，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等。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1996年和2001

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团委员、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2006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此外，还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文学专家组组长，国家图书奖一、二、三、四、五届评奖委员会委员，1991—1995年全国长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副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和鲁迅文学奖评论奖评委会主任，《新文艺大系》总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副主编，湖南大学文学院特聘院长、名誉院长等。1948年曾为《骆驼》撰写文学评论，20世纪50年代曾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电影剧本。1958年后参加主编北京大学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两卷本、四卷本），1960年后参编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上述二书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曾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迄今主要著作有：

个人文学评论集

《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

《新时期文学论评》（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张炯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文学的攀登与选择》（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文学的回眸与思考》（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走向世纪之交》（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文学评论与对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个人专著

《创作思想导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新时期文学格局》（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1998年9月再版）

《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1 月出版）

《美·真诚·朴素——丁玲创作论》（与王淑秧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 2 月出版）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出版）

《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学习出版社 2000 年 7 月出版）

《丁玲名作欣赏》（与王淑秧合著，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出版）

个人编著

《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出版）

主编著作

《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与邾琰共同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6 月出版）

《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1 月出版）

《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中央戏剧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出版）

《当代文学新潮》（与朱寨共同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出版）

《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出版，2001 年再版）

《文艺创作知识丛书》（与蒋守谦共同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出版）

《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共 2 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年出版）

《学者评论家丛书》（共 15 本，陕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7 月出版）

《世界华文文学长篇小说丛书》（共 10 本，与王淑秧共同主编，华夏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中华文学通史》（共 10 卷，与邓绍基、樊骏共同主编，华艺出版社 1997 年 9 月出版）

《中华文学通典》（共四卷，与邓绍基、陈骏涛共同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此外，已发表而尚未结集的论文约有 80 万字。

以上成果中《新时期文学论评》、《新时期文学格局》、《走向世纪之交》和《新时期文学六年》、《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新中国文学史》和《中华文学通典》曾获“中国图书奖”，《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曾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佳研究著作奖”。本人曾被列入《中国作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词典》、《中国文艺家传集》和《世界名人录》、《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辞典》，并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二十世纪成就奖”，颁予刻有“Zhang Jiong”（张炯）名字的银质奖章。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还授予“华文文学研究奖”。

我的文学生涯（代序）

1

我最早发表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是1948年12月发表在福州地下党的秘密刊物《骆驼》上。评的是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那时我是十六岁的中学生。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出外抗日，母亲因病住娘家，我便随母亲在故乡——福建省福安县桥溪村的国民小学读书。桥溪是个隐在青山碧水间的秀丽的山村。溪水上有一座在我眼中很壮伟的带屋脊的廊桥。长廊里有供人烧香的神龛，有让行人休息和趴在那里钓鱼的长板凳。当时国民小学尽管简陋，只能借寺庙上课，而且只有四个年级，但我外祖父家有许多藏书。我母亲刘琼读过大学，年青时参加过共青团，后因染肺病，只好回家休养。有些书是她买回来的。所以书橱里不但有《左传》、《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三国演义》、《鲁滨孙飘流记》、《斯文赫定探险记》、《九尾龟》，以及《鲁迅选集》、《冰心选集》、《丁玲选集》、《王鲁彦选集》等，甚至还有线装书《二十四史》和《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集》。在两山夹水的山沟里，抬头便见山，山外的世界有多大，有多精彩，都是看不到的。然而这些书只要能读懂的，我都拿来读。这些书自然大大充实了我的精

神世界，使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有些书，特别是文学作品，我读得如醉如痴，废寝忘食。后来上了初中，妈妈当了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领着我就住在图书馆里。这更使我如鱼得水，得其所哉！每天课后，我便钻到楼上书库里，找到有兴趣的书就蹲在书架旁读起来。不但读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还读了《七剑十三侠》、《绿野仙踪》和《金粉世家》等许多小说。有个暑假，家里让我去跟县城里的一位余姓老秀才补习古文。他是个瞎子，却能背诵许多古书，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教许多学生，有的读《诗经》，有的读《左传》，教我读的则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因他从头到脚把我摸了一遍，认为我年纪小，只能读《四书》。上高中前，我还是读过不少书的。我对文学的兴趣也是在读书中培养起来的。1948年秋，我从家乡来到省城福州，考进福州三一中学。这是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这所学校上过学。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很腐败，我由于接触到进步同学和革命书籍，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闽浙赣区党委福州城市工作部的高农支部所办的秘密刊物《骆驼》编辑部。这个刊物是福州高级工业学校的学生林士锋主编的，他后来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另一位介绍人就是高级农业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潘向葵。刊物每月一期，是综合性的，政治、经济、时事和文学的稿子都有，主要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思想和解放区的新生活。刊物由编辑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和发行。我便在林士锋的领导下在进步同学间秘密发行和传阅这份刊物，也写一点稿子。评论《表》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当然，文章很短，也很幼稚，可以称为我的处女作。

但我当时并未能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走下去。因为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搞学生运动，做革命工作。1949年4月初又受命与

同一支部的林友川、林士锋去闽东北白云山地区去开展人民革命武装起义，打游击。几个月间我们赤手空拳夺取敌人的枪支来武装自己，从三个人发展到178人的队伍，打下不少乡镇，也接触了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直到1949年8月初与南下的解放大军会师，会师后随大部队向福州进军。我被分配到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兼省军区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部队做政治工作，后来又当了文化教员，与文学基本无缘了。当然，在部队的六年我也读了不少书。有《联共党史》和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更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还有苏联作家的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以及《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名著不下几十部。二十岁前的生活经历和读的书不但打下了我后来学文学的根底，还影响了我如何为人做事。1955年在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中，部队允许我报考大学。想不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就把我录取了。这也奠定了我后来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道路。

2

那时北大的老校址红楼还在，而新校址则是原燕京大学所在的燕园。“十一”国庆节游行，我们黎明从燕园出发，到清华园乘火车进城，再步行到沙滩旧校址的民主广场集合，出发去天安门广场。游行完就到沙滩红楼歇息，晚间再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联欢晚会。燕园的古典式建筑和美丽的校园固然使我感到如入天堂，但民主广场和红楼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解放前学生运动的堡垒，更使我感到作为北大学子的分外庄严和骄傲！

而使我感到格外幸运的是，那时北大中文系聚集了大批著名的教授。

那时教我们先秦文学的是游国恩先生。他个子矮小，白发苍苍，一上讲台，就先把要教的作品写在黑板上，对《诗经》和楚辞，一首首他都背诵如流。他规定要我们至少背出《诗经》75首和《离骚》的全文。我和同学们自然都很认真去背。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林庚先生教的。他是著名诗人。他讲“建安风骨”，讲“三曹”，以及解释“高台多悲风”等诗句，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又给我们讲“初唐四杰”，讲高适、岑参和李白、杜甫，他对于诗的体会很独特，能把真正的诗意讲出来，让我们体悟诗的美。林先生至今仍健在，前不久学生辈还集会北大，为他庆祝九十五岁寿辰。任继愈先生的夫人冯钟芸先生也为我们讲过唐代文学，吴小如、季镇淮先生讲过宋代和元代文学，明清小说是吴组缃先生讲的，王瑶先生和当时在读研究生的严家炎先生讲现代文学。吕德申先生讲文学概论。语言课方面，魏建功、周祖谟先生分别讲古代和现代汉语，王力先生讲汉语史和诗韵学，高名凯先生讲普通语言学，朱德熙先生讲汉语语法。还有些选修课，如《红楼梦》是吴组缃和何其芳都讲，美学是朱光潜和蔡仪各开各的，这让我们听到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当然还有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以及外国文学史许多课。李赋宁先生讲西方文学史，季羨林先生讲东方文学史，任继愈先生讲中国思想史，等等。我记得杨晦先生为我们讲艺术史，光“九鼎”就讲了一个学期。当时真是名家会集，俊彦如流。他们讲的课，都叫我一生受用不尽。从1955年到1957年，我们总算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比较扎实地读了三年书。虽然存在1957年夏的反右派扩大化。而从1958年开始，循序渐进的读书生活便受到“大跃进”、“大炼钢铁”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运动

的冲击。那年我参加过修建十三陵水库大坝的劳动；下过乡，挖地三尺，把生土都翻上来，认为可以肥田，实则造成减产；还到教授家里把好好的壁炉拆掉，取耐火砖去砌炒钢的小炉，结果所炒之钢，悉成废铁疙瘩；甚至把同学们的藏书都集中起来，在宿舍里办“共有共用”的“共产主义之家”。所以到大学的最后两年，几乎无法再系统听课，好好读书。从做学问的角度看，这真是一生的遗憾！而堪以告慰的是，我们年级在那两年里先后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集体编写了两卷本和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这对我一生从事文学的研究，关系至大，其中得失也深堪反思。

3

我所以考中文系，原想将来当个作家。我觉得自己有许多生活可写。1956年学校办了个文学刊物《红楼》，我便试写了一篇反映我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友谊的小说，投给了《红楼》。红楼原是原北京大学屹立于城里沙滩的老校舍，那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在那里工作过。蔡元培当过校长，马寅初当过教务长，当然还有鲁迅、胡适、钱玄同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都在那里教过书和学习过。当年《新青年》、《新潮》的编辑部也设在红楼。解放前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更是学生运动中示威游行的出发地。所以红楼又是民主堡垒的象征。把刊物的名字叫《红楼》自然寓有深意。《红楼》第一期把我的小说作为头版头条发表了，标题叫《千树万树梨花开》。当时在校园颇为轰动。刊物行销达四千册。五十年之后，北大百年校庆，编辑了一本纪念文集《北大风》，还把这篇小说收辑在里面，与胡适、俞平伯等名家的作品排在一起，这是我当年料想

不到的。后来我又写了《重逢》、《蓝豹子》等小说，还写有一些诗歌和散文也在《红楼》发表，之后其中有的曾被《萌芽》和《解放军文艺》转载。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陈丹晨当时鼓励我写下去。这位后来当过《文艺报》副主编的同学中的老大哥认为我有希望朝创作方面发展。可是，这个过程却被1958年的大跃进打断了。

进入大学后，我曾被选为班会总干事，即班长，又当过班上的共青团支部书记。1958年，被选为年级的班联会主席。北大中文系1955级共四个班，一、二、三班是文学专业，四班为语言专业。那时，一个年级一个党支部，所谓班联会就是管全年级的四个班。班干部在当时的任务很重，由于提倡又红又专，所以除了自己要学习好，还得保证全班同学门门功课都考五分，即所谓“满堂红”。这使我产生很大的精神压力。久之乃至神经衰弱，难以入睡。记得有次年末考试，连续半个月我都未能睡着，头痛得不得了。我决定休学，到农村劳动去，以休养脑子。学校教务处也批准我休学了，临离校，我到党支部转组织关系，支部书记陈丹晨同志说，学校很快要实行生产劳动与教学、科研相结合，你回农村去劳动，反不如留在学校劳动，又不耽误学习。听他的话，我就留下了。后来去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我被编入北大火箭突击队，在大坝上与解放军十八勇士和北京铁姑娘队比赛卸火车运来的沙石料，劳动强度极大，每卸一次，全身汗流得像水洗了一样。这样半个月，居然把我的神经衰弱和失眠症都治好了。大跃进时期，学校提出批判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还动员学生批判老师教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党支部召集全年级同学讨论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认为，与其去批判老师的观点，还不如我们自己写一部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学史。当时决定下来，便成立个编委会，由费振刚、阎国忠、谢

冕、张少康、孙静和我组成，并推举费振刚和我任正副主编。经费是新任党支部书记，我是班联会主席，我们也就责无旁贷地干起来。同学们决定利用暑假三十多天的时间，突击写成一部两卷本，计8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我们年级一、二、三班全部参加文学史写作，四班是语言专业，由陆俭明同志领导编撰一部《汉语成语辞典》。同学们的倡议得到系里和学校领导的支持，于是大家便到图书馆去把有关的图书资料都借回到宿舍，除了白天，晚上也挑灯夜战。人民文学出版社听说后，便决定要出版我们的书，该社古典文学部的老编辑黄肃秋等先生为抢出版时间，都下车间与大家一起搞校对。当时真是热气腾腾，充满一片忙碌的战斗气氛。果然，奋战三十六天，这部红皮本的《中国文学史》便出版了，真不愧为“大跃进”速度。陈毅元帅还写信表示祝贺！费振刚同志代表我们集体出席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各大媒体更对这部学生编写的文学史做了广泛的报道。但由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面存在简单化倾向，所以出现了若干带有全局性的“左”的错误。例如认为“民间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反映”等。这些观点实际上多受到我的影响，因为我负责提出全书的指导思想。后一观点，我又接受了茅盾先生的《夜读偶记》的影响。这些错误的指导思想，1959年便受到何其芳和周扬同志的善意批评。我们也觉得他们的批评有道理。所以，我们接受批评，决定重写这部文学史，并请系主任杨晦和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冯钟芸、陈贻焯等先生参加编委会，帮助我们审稿和把关。这就是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12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两套文学史均署“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集体编著”。在这两套书编写过程中，我除了参与近代文学部分的撰写

和全书的审稿、改稿外，全书的《绪论》和《结束语》也是我起草的。后一套文学史自然改正了前一套的明显错误和偏颇之处，所以那时被国家教育部颁布为“大学文科教材”。

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我的很重要的一段学术经历。尽管不免幼稚，但毕竟它使我获得了第一次做学术研究和组织集体编书的经验，也使我在老师们的帮助下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去透视中国文学的宏观状况，大大锻炼了我的研究和概括的能力。从而也使我有参与尔后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工作，包括从事文学批评。大约是1959年，我参加了《电影艺术》编辑部召开的关于电影《青春之歌》的座谈会，我的发言后来就发表在《电影艺术》月刊上，这是我的第二篇作品评论。

4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号称“三面红旗”。这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自然是重大的事件。建国初虽然在文艺界有过批判《清宫秘史》、《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还有对所谓“胡风集团”的揭露与批判，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蒸蒸日上，政治稳定，社会清明。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发展、繁荣文艺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而人们的精神面貌总体比较振奋，心情也比较舒畅。1956年受到苏联批判斯大林和解冻文学的影响，我国文艺界的思想也活跃起来，文艺创作中涌现了许多题材、主题、形式、风

格都有新开拓的作品。大学校园中受到“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的鼓舞，学习风气也相当好。

但1957年从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发展到后来“反右派”的扩大化，把许多给党提过各种批评意见的人都打成“右派分子”并定为“敌我矛盾”。这使许多人思想不通，我也属思想不大通的一个。虽然我也参加了反右派斗争，后来却被定为“思想右倾”，尽管做了检讨，仍受到“党内警告”的处分。我当时与谢冕合作写过一篇报告文学《遥寄东海》，在《红楼》上发表，报道北大运动发展的情况和我们自己认识的过程。这也成了我被处分的一个根据。不过，我的检讨也很真诚！当时觉得自己是小知识分子出身，立场不够坚定，还是思想没有改造好，真诚地觉得要继续改造。那时，同学们认为我属于“年青的老革命”，连我这样的年轻人都自觉要改造，那些年老的知识分子，那些教授们就更是这种心态了。那时听说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朱光潜先生也非常认真地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觉得没有什么可奇怪！年轻人毕竟接受新事物快，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深挖土地等，我们都欢欣鼓舞地接受。对我国将要赶英超美，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也深信不疑。那时集体编书、集体创作，不计名利，甚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付给我们的一万多元的大笔稿费也不要，都捐给学校，很多活动皆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进行的。在我们编写文学史的同时，王瑶先生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稿》便受到下一年级同学的批判。所以，当时老师的思想压力是相当大的。以至从1957—1960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新著出版。这无论是对学术名流毕集的北大，还是对我国的整个学术界，无疑都是一大损失！而对于所谓“白专”道路的批判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际放弃，更使许多学习努力，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也不得不却步，乃至噤若寒

蝉！而从国家学术的长远发展来看，损失更大。这真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

5

北京大学的师长有几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的师范楷模使我永志不忘！

系主任杨晦先生，小个子，长得很像鲁迅。刚入学时，他在文史楼前给我们新同学训话，第一句就说，北大中文系是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的，不是培养作家的，所以你们想当作家而来北大就错了。这话当时仿佛给我浇了盆冷水！那时我的印象，他似乎很严厉。但后来接触多了，印象完全改变，觉得他就像慈母一样对待学生。他是党员，而且是系总支委员。我到过他家多次。他家住在成府的燕东园，据说那是司徒雷登当燕京大学校长时为教授们盖的别墅式住房，园里绿草如茵，环境相当好。杨先生一家就住着一栋。他总在客厅接待学生。听说当年五四运动时是他第一个越墙进入赵家楼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曹汝霖官邸，并且放火烧了曹家，这使我很感兴趣，第一次登门拜访便是请他讲五四时代的事。1919年他刚好19岁。他是辽宁人，家境贫寒，但学习成绩好。他说，北大那时叫京师大学堂。那时，校役都管学生叫“老爷”。蔡元培先生来当校长后，采取学术上兼容并蓄的方针，所以教授里既有辜鸿铭那样留着前清的辫子上讲台的，也有胡适那样西装革履很洋派的。同学里信仰也五花八门。有信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有信基尔特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信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学雇别人代考，进了北大就天天到前门戏园子听戏，从来不上课。大家住在宿舍里，同住一室甚至互不交往。床与床之间还用布帘隔开。有时信无政府主义的与别人争论起来，

跳到桌子上，把书架也都推倒了。至于他自己是不是第一个跳进曹公馆，他说，已记不清。但他记得自己是从窗户进去的，不是翻墙的。进去后他就把门打开，同学们便一拥而入；曹汝霖带着小老婆从后门跑了。当时公馆里还有个日本人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章宗祥便挨了打。至于火是谁放的，他不知道。后来军警赶来把学生抓了几十个。

杨先生讲述时，情绪很激动，完全是当年热血青年的样子。还有一次，我去请教他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他旁征博引，给我讲了足足三个小时，就像给一个人讲课一样，真是做到了“诲人不倦”！杨先生的学问很渊博，可惜他终生没有很好地把它整理出来。

魏建功先生也使我特别感动！记得他第一次来给我们讲古代汉语课，迟到了三分钟。他满面通红，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气咻咻地抱歉道：“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记错了教室，所以迟到了。这还是我登上大学讲台三十年来的第一遭！”魏先生不但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还是五四时期便开始收集和研究民间文学的先行者。他住在中关村，我有次上他家请教一个问题，他便在满屋子书柜前爬上爬下，翻箱倒篋地帮我找一本书。我看了很过意不去，请他不要找了。他还是找，而且最后终于给找着了。从书里他给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真使我感动得不得了。我一再道谢！他说，应该的，应该的，从前他的老师鲁迅先生对他也是这样！

还有教我们普通语言学的高名凯先生的学习精神也叫我深受感动。他是福建福清人，法语很好，翻译过巴尔扎克的许多作品。他已会几种外语，而且五十多岁了，但他还抓紧一切时间再学新一门外语，连坐公共汽车进城，他还一只手拉着扶手，另一只手拿本小辞典背诵外语单词。其治学之勤奋如此，叫我们这些